

近年来我国城市区县体制相关研究进展

焦苗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国际海洋与城市科学研究院, 上海 200062)

摘要: 城市化快速发展进程中的城市区县体制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当前相关研究已有丰富的成果积累, 主要集中于城市区县的区划调整、建制转换、体制改革等方面, 本文就此对我国学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简略综述, 以期对今后此领域研究的深化提升提供启发。

关键词: 城市区县; 区划调整; 建制转换; 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 F57

文献标识码: A

现代城市发展包括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空间结构优化、公共服务提升、城市区域联动等众多内容, 其中, 城市化始终是最为重要和关键的主题, 改革开放以来, 城市化研究在路径选择、规模效益、产业转换、动力机制、阶段特征等关键问题上均展开了全面研讨; 90年代中期以来, 相关研究正逐步深入到体制层面, 特别是在区县这一层级上, 相关区县体制研究已经充分展开, 主要集中于城市区县的区划调整、建制转换和体制改革等方面。本文对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力求对日后相关研究提供启发。

1. 城市区县的区划调整研究

1.1 区县及以上政区调整

纵观我国城市区县的发展进程, 市辖区在发展中存在着种种问题, 进行市辖区区划调整势在必行, 主要包括四种形式: 撤县或县级市设立新区、增设新的市辖区、对原有市辖区进行全面或局部调整、单纯扩大市区的地域范围^[1]。市辖区调整动因既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 也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是市场化分权改革在城市层面的反映^[2]。而撤县(市)设区主要目的是促进中心城市规模, 理顺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市之间的关系^[3], 有利于整合发展资源, 减少协调矛盾, 有利于大城市与周边地区的统一规划^[4], 等等。但是撤市设区作为整合区域资源的途径之一, 其作用是有限的。如李开宇等以广州市的番禺区为例, 对撤市设区的绩效进行了分析, 他们认为番禺区的设立总体上是成功的, 对城市交通条件的改善、经济空间的提升以及城市规划力度的加强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也有消极影响, 并针对问题提出了提升区划调整绩效的途径^[5]。林拓等在系统分析我国大中城市区县政区重组进程的基础上, 认为主要存在整体型、划入型和析出型三种重组模式, 是在形态与绩效提升的调适机制、战略与空间布局的响应机制、城乡与区域统筹的催化机制的作用下引发的区县战略重组^[6]。

目前, 我国郊区与市区同为市辖区, 但其管理性质和层级却存在明显不同, 郊区实行市—郊区—乡镇的三级政府管理方式, 而市区却实行市—区—街道办事处两级政府的管理方

收稿日期: 2012-1-2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1JJDZH00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11YJA810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焦苗(1988—), 女(汉族), 河南焦作人,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城市制度与管理、城市与海洋生态。E-mail: jiaomiaomiao11@163.com

式,而且由于郊区分布在市区四周呈包围状,这种结构严重阻碍了城市的发展,造成了城市发展空间短缺的现象。为了克服这一难题,刘君德等指出应将城区与郊区一起考虑重新划设新区,使得城乡结合呈扇形状态向外放射^[7]。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市辖区的行政区划调整应该做到区划调整与空间结构调整相结合,与城市治理结构相结合,与城乡一体化相结合^[8]。

1.2 基层政区演变及其调整

基层政区指区县以下政区,主要是乡镇建制。我国乡镇由来已久,建国以来,由于国家政策变化,乡镇撤并频繁。侯保疆等梳理了建国以来的国家政策变化与乡镇建制波动变化情况,认为从1998年开始的乡镇处于大规模撤并过程之中,并总结了近年来我国乡镇撤并的现行模式构成、撤并标准与范围、撤并目标取向^[9-11],等等。基层区划调整虽然频繁,但其管理幅度演变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存在一定规律,如次级区划的变动人为因素影响比初级区划更明显,且其幅员的骤降缓升;县以下区划幅员趋于扩大,且有由虚向实的变化倾向^[12]。

对于乡镇撤改原因,部分学者借鉴了瑞典学者瑞典乔克普森的方法,以河南驻马店市的平舆县为例进行实证研究所发现^[13],乡镇规模与郊区乡镇发展的不适应性催化了乡镇撤并。而林拓等在分析和梳理新世纪以来的我国70多个大中城市基层政区调整过程的基础上,提出基层政区调整受到行政区域发展的调适机制、城市空间扩张的整合机制、城乡区县变动的重组机制影响^[14]。在撤并过程中,需要提前确定乡镇撤并后新的领导班子、机构设置、人员编制、行政中心、政区名称等,以实现平稳渐进改革。“撤乡建镇”意味着行政编制、领导干部人数和各种待遇的提升,但行政编制增加,势必要压缩用于城镇建设的经费,农民负担可能加重^[15],因此乡镇政府规模的扩大必须有一个基本限度,这个限度以维持并提高乡镇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服务能力、实现乡镇政府的有效治理、有效满足乡村社会的公共需求为原则^[16]。

值得注意的是,基层政区调整后出现了乡镇区域规模适度,乡镇规划布局,被撤乡镇驻地管理和再利用问题以及乡镇集体财产处理等问题^[17-19],乡镇行政区划及管理亟须改革。柳成焱等提出了若干改革路径:对乡镇管理层次去留的选择,对乡镇数量多少的选择以及对乡镇规模大小的选择^[20]。彭华以湖北乡镇改革为例,提出了乡镇管理的改革思路,如划清政府与社会的权责,还权于社会,使地方政府从全能政府向有限责任政府转变^[21],等等。林拓提出从滞后到前瞻、从自在到自为、从多元到一元、从分立到互动的基层政区调整改革的基本策略^[22],对日后各地基层建制调整改革都具有启发意义。

2 城市区县的建制转换研究

2.1 区县及以上建制转换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撤县改区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展开,主要集中于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等特大城市。对于县(市)改区的动因,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研究,谢涤湘、文吉、魏清泉等认为市管县体制、大城市协调发展的机制没有真正设立、对中心城市及大城市的偏好等是县(市)改市辖区的背后推动原因^[23]。张蕾、张京祥等指出县(市)改区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做出的正确选择,县(市)改市辖区前土地由受市县二元管理体制,在县(市)改市辖区之后,土地实现了城市政府的统一管理,土地交易秩序规范^[24]。然而,县改区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撤县(市)改区后大量的农村人口变成了城市人口,造成了虚假城市化,且县级政区的独立性下降,积极性和主动性降低^[25];由于体制制约和职能的缺失,区域经济发展滞后^[26];财政方面失去原来省及市里面的财政补贴,且其城市功能不明显,影响农业生产^[27];失地农民权利保障缺失^[28-29],等等。因此,县(市)改区利弊共存,应当适度推行县(市)改区。如戴均良对直辖市及特大城市的郊县改区的利弊进行相关研究,认为直辖市撤县改区利弊共存,各地要因地制宜,不能千篇一律,在有些地区县制应该继续保留,时机成熟才能进行县改区^[30]。

关于县改市,学者们也进行了深入探讨。周振鹤等指出我国最初进行县改市的目的是为了以县域或某一经济发达的镇为核心,来带动全县乡村发展,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全县现代化^[31]。80年代开始,我国整县改市速度加快,很多学者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县改市的速度过快,带来了种种的问题,包括影响城市建设、城市规划以及城市化进程^[32];对农业产生负面影响,并带来虚假城市化^[33],等等,甚至有很多城市为了达到县改市目的不择手段,虚报产值、谎报人口……产生很多事与愿违的情况,应该要“断了县改市的路”^[34]。不过,戴均良等则认为县改市是我国设市模式的创新,相对于传统切块设市而言,能够减少管理成本,更好促进城乡融合,以城带乡,避免市县矛盾,节约耕地,提高城市规模效益^[35]。

我国设市模式多种多样,大致经历了“切块设市”到“整县改市”的变化,整县改市相对于切块设市产生的城市发展空间狭小,城乡二元发展问题,的确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虚假城市化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有学者提出我国应该推行“城郊合治”和新的“适度切块”的设市模式^[36]。随着现今整县改市的模式弊端日益显露出来,选择县辖的规模较大而且条件优越的乡镇改设为市成为一种趋势^[37]。如果将县辖乡镇改设为市,就形成一种新的管理体制“县辖市”,它是农村城市化的战略措施。如贺曲夫,刘焱等从行政区划改革趋势、现行设市模式与县辖政区体制及其弊端以及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要求等方面,论述我国实行县下辖市体制的可行性,并论述未来县辖市体制基本内容^[38]。县辖市为发达地区乡镇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出路,不仅具有切块设市和整县改市两者的优点,还能真正反映城市化发展的程度,也能保留传统县制广域性政区的特点,促进农村地区的发展,保证县制的稳定^[39],不仅如此,在同行政级别政区的管理方面,县辖市还能减少行政分割程度,增强地区协调性,但县辖市也会带来种种问题,如,贫富差距增大及公平、效率问题等^[40]。

2.2 基层政区建制改革研究

中国建制镇的形成和发展与区域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基础关系密切,人口分布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制约其分布规律,此外还受自然地理、资源分布,交通条件影响^[41]。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小城镇建设、现代城市更新、开发区和城市新区建设等正对乡镇建制产生深远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索成为当前基层建制改革研究的前沿,林拓、水内俊雄等在其著作《现代城市更新与社会空间变迁》已经作深入阐述^[42],在城市更新与基层建制方面,申立在分析上海石库门空间变迁的过程中发现基层建制对于城市住宅的保护更新等具有深层次影响^[43];在开发区与基层建制关系方面,林拓、张修桂等从发展基础、功能互补、组织建构等几个方面探索高新园区与乡镇联动发展的体制创新^[44];在城市新区与基层建制关系方面,蔡伟丽、申立在我国100多个城市新区经验数据的分析基础上,阐述了城市新区在构建“服务型政府”过程中,与行政区(尤其是基层建制)之间的复杂体制协调关系^[45]。除此之外,关于乡镇建制改革的大多数仍集中在构建中心镇、重点镇、新市镇等方面。

1) 中心镇研究

中心镇对农村城市化具有示范带动作用,是推动地方经济前进的动力和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重要举措^[46]。学者对中心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心镇的选择方法。赵勇等选取9项社会经济指标建立了河北省中心镇选择评价体系,借助SPSS软件应用因子分析法对全省建制镇的综合实力进行评估,进而选出中心镇^[47];杨建国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嘉兴市53个镇经济社会进行综合评价,并对嘉兴市中心镇建设区域布局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48]。二是中心镇人口规模研究。袁中金等探讨了中心镇形成集聚效应的人口规模门槛^[49];李阿琳,何仲禹以具体村镇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剖析了处于人口重组区域、以服务设施聚集人口的村镇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用地利用上的特征、问题与原因^[50]。三是中心镇发展途径。如陈俊峰提出推行扩权强镇,改革中心镇行政体制^[51];李仁彬提出,可以采取原地纳税、原地统计产值、管理费返还等办法,引导周边村镇二、三产业向中心镇集中来发展中心镇经济^[52]。

2) 重点镇研究

目前,重点镇已成为很多地区建设与发展的重点,如成都市确定30个重点镇和14个优先发展重点镇,集中利用有限资源,促进这些有条件的镇发展成为具有较强辐射带动能力的区域中心城镇或小城市^[53]。关于重点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点镇发展的动力机制与约束条件。学者们分析了重点镇发展的动力因素,提出三方面的因素^[54]:乡镇工业追求规模效益产生的集聚需求、农村人口的产业转移及消费结构提升的需求、资源节约利用的需求。二是重点镇建设的指标体系。李加林等围绕重点镇建设的内容和目的,对相关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筛选综合,形成重点镇建设的指标体系框架^[55];朱雯等针对重点镇,提出了镇村一体化的规划内容与绿化指标等^[56]。

3) 新市镇研究

新市镇的建设是改善人口分布、中心城市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Hui ECM, Lam MCM, 2005),目前国内学者对新市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建设模式与开发规划上,如张开琳指出新市镇的建设必须成立新市镇委员会,构建镇镇联动的发展模式,建成后成立相应的市镇政府对其进行城市管理等^[57];田先钰等则认为,新市镇的建设要对各级政府职能进行重组,如建立新市镇管理委员会等,并在新市镇规划、资金等方面提出新的见解^[58]。此外,学者们对新加坡与香港等地的新市镇也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如王蕾,袁中金探讨了新加坡新市镇与地铁整体规划,以及城市的保护与更新等,为我们建设中国的城市提供了借鉴^[59];还有学者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探究新市镇的土地发展与社会问题等^[60]。娄清芳对英国、美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国新市镇的特征、经验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对我国大陆近100个新市镇进行了类型划分,分为“镇域包含型”、“组团联动型”、“综合发展型”、“飞地开发型”四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新市镇发展中的开发地位确立、开发主体协调、开发资金运作、开发规划管理、开发政策保障等五个方面,是目前我国新市镇领域较为综合的一项研究^[61]。

3.城市区县的体制改革研究

3.1 市辖区体制改革研究

目前我国学者对于市辖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市辖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市辖区是市的组成部分,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政区单元,这主要表现在市辖区财政是市的二级财政,不能单独行使中央和省政府赋予的职责。我国的市辖区的行政区划体制形成时间较晚,也存在诸多问题,如市辖区的管理幅度相差悬殊,市辖区命名不规范,等等^[8]。市辖区行政管理体制职能定位不明确,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62]。市辖区的主要功能分为法定功能、经济职能和社会功能三个方面,尤其是社会公共服务功能,市辖区一般承担了大量的公共服务功能,如全民体育健康,残疾人服务,农村合作医疗,中郊区小学的教育,职工工资,三农问题^[63-66]。尽管市辖区虽然担负着诸多职能,但在市辖区职能的配置上,市辖区却缺乏应有的行政地位,主要以协助角色出现,其地位、权利、利益上处于绝对的弱势,有很轻的依附性;而且存在着权责利的错位,承担经济、政治、社会等职责多但管理权限小,承担事务繁多与享受公共财政补贴少两对矛盾;管理职能上存在着一些空缺,存在管理不到位的现象^[67]。

3.2 县制体制改革研究

县制是我国最悠久也最为稳定的行政区划体制,学者们对我国县制沿革的进行了详尽的研究,既有对整个县制沿革的研究^[68],也有对其中某一朝代县制沿革及特点的研究^[69]。虽说县制是我国最为悠久的行政区划建制,但现有县制存在诸多弊端。如目前我国实行的建制镇的设置标准人数要求仅为2000人,门槛过低混淆了镇与乡的区别^[70];县制过小是制约县域

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71]。因此应该通过调整县乡规模从而改革现有县制,以促进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72]。对于如何进行现有县制的改革,有研究提出应该在有关省区实行扩大县乡规模的试点,待取得成功后再进一步的推行,变革现有的管理体制。目前县制的县镇两级政府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新形势,造成了该县政府管的管不起来,管起来的又越过了镇政府,为了克服这一弊端东中部的很多县已经在县内设立街道办事处的试点,将经济发达县的工作重点从农业经济转移到工业经济上来,应该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改革创新的范围^[71]。

3.3 市管县与省管县体制研究

1) 市管县体制研究

自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普遍实行市管县体制,市辖县初期不仅是为了解决大城市的蔬菜、副食品供应等问题,主要是为了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确实也克服了市县矛盾,但市管县管理体制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73],还导致行政成本增加、效率降低、市县矛盾突出、城市发展不协调以及虚假城市化等问题^[74]。“市领导县”体制已经成为我国统县政区的主体和矛盾的集中点^[36]。目前关于市管县体制的改革学者们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实行省县直辖与强县扩权。如孙学玉等认为应该增加省级数量,市县分治,构建省直接管理县(市)的少层次大幅度的、扁平化的公共行政体制^[75]。刘君德等认为省县直辖市经济迅速发展对权力扩张的内生性要求,需要政府权力来更好的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需要更大的权力来与地级市政府进行博弈^[36]。另一观点认为可以在市县之间建立市县联合协调机构来处理市县公共事务。如,浦善新认为由于市县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市辖区与县之间建立市县联合机构,建立双层的政府管理机构可以为市县提供交流沟通的渠道^[76]。

2) 省管县体制的研究

省管县是近几年来行政管理体制中最受关注的模式,已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试点。政府管理体制上的“省直管县”是指由目前的“省—市—县”三级体制转变为“省—市、县”二级体制,替代“市管县”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77]。实行省管县体制改革,不仅可以解决县级财政困境、统筹省域内经济平衡协调发展,还是实施新农村战略和小城镇战略以及缩减成本和提高效率的需要^[78]。然而,综观当前各“省管县”体制改革试点,各个省份推进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路径选择、扩权县(市)范围及扩权内容等方面存在重大的区别^[79],当前的“省管县”改革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性,应当根据不同省区的具体情况展开“省管县”改革^[80]。

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如制度化的利益格局难以破解,非制度化分权使依法行政遭遇尴尬,非整体性放权使县级政府面临“两个婆婆”等。究其根源,一是各级政府职责权限的同质性;二是省管县改革设计的过渡性^[81]。因此,进一步推进“省管县”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必须明确改革的战略思路,合理定位省、市、县三级政府,理顺条块管理体制,扩大社会自主管理权限,定时进行政策清理,建立改革监察体系^[79]。

对于如何开展省管县体制改革,寇明风、王晓哲认为省管县的目的是通过将有限的财力资源留存在县级,将更多的自主权赋予县级政府^[82]。完善“省管县”体制,首先应该健全法律体系,为推进“省管县”体制改革提供保障,并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不能一刀切^[83]。而在具体实践中,省管县体制可以上移公共服务统筹权,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下放公共资源配置权,增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完善省市县权责配置,促进地方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解决县乡财政困难,推动农业农村健康发展^[84]。倘若“省管县”改革只是形式改变,没有基于现实问题分析的实质内容变革,任何形式改变并不足以解决现实问题^[82]。

4 结语

纵观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城市区县相关体制的研究,研究成果颇丰,主要集中在城市区县的区划调整、建制转换和体制改革等方面。学者们不仅从宏观层面上深入分析了我国城市区县的区划调整和建制转换的动因、规律,剖析了调整之后产生的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区划调整、建制改革的方向与路径;而且在微观层面上以具体城市为例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这些来自学者们的不同声音,都为今后的城市相关体制的改革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 [1] 庞森权. 论议地级市市辖区的行政区划调整[J]. 中国方域: 行政区划与地名, 2002(03)
- [2] 罗震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行政区划变更特征及趋势[J]. 城市问题, 2008(06)
- [3] 谢涤湘. 快速城市化时期的行政区划调整研究[J]. 现代城市研究, 2009(04)
- [4] 魏衡, 魏清泉, 等. 城市化进程中行政区划调整的类型、问题与发展[J]. 人文地理, 2009(06)
- [5] 李开宇, 魏清泉, 张晓明. 从区的视角对“撤市设区”的绩效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J]. 人文地理, 2007(02)
- [6] 林拓, 等. 我国大中城市发展与现代城市型政区改革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课题, 项目批准号(05JJDZH229), 2011
- [7] 刘君德. 新时期中国城市型政区改革的思路[J]. 中国行政管理, 2003(07)
- [8] 时磊. 中国中心城市市辖区区划改革研究[J]. 青岛行政学院学报, 2005(05)
- [9] 侯保疆. 乡镇建制: 历史、现状及未来[J]. 汕头大学学报, 2005(04)
- [10] 柳成焱. 略论我国乡镇行政的历史演变及其发展趋势[J]. 科学社会主义, 2006(04)
- [11] 张新光. 论我国乡镇的建制规模、职能定位与机构设置[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5(09)
- [12] 熊万胜. 基层行政区划的管理幅度演变: 规律与启示——对一个县 150 年区划演变的纵观性研究[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07(04)
- [13] 王德, 郭洁. 乡镇合并与行政区划调整的新思路和新方法[J]. 城市规划汇刊, 2002(06)
- [14] 林拓, 等. 大中城市郊区农村城镇发展与基层政区改革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 项目批准号(02BZZ031), 2010
- [15] 朱守银, 廖洪乐, 吴仲斌. 当前各地乡镇体制改革的主要做法及比较[J]. 红旗文稿, 2006(09)
- [16] 马宝成. 乡镇政府: 合法性基础与规模限度[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7(03)
- [17] 王兴平, 胡畔, 等. 苏南地区被撤并乡镇驻地再利用研究——以南京市六合区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11(10)
- [18] 祝宝江. 乡镇行政区划调整难题的实证研究[J]. 北方经济, 2005(03)
- [19] 吴仲斌. 乡镇撤并: 问题与对策[J]. 红旗文稿, 2007(13)
- [20] 柳成焱. 我国乡镇行政区划的演变特点及其改革路径[J]. 天津社会科学, 2006(04)
- [21] 彭华. 治理转型的乡镇综合改革——以湖北为例[J]. 农村经济, 2010(09)
- [22] 林拓. 城市化进程中的基层政区改革: 浦东的实践[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3(02)
- [23] 谢涤湘, 文吉, 魏清泉. “撤县(市)设区”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发展[J]. 城市规划汇刊, 2004, (04)
- [24] 张蕾, 张京祥. 撤县设区的区划兼并效应再思考——以镇江市丹徒区为例[J]. 城市问题, 2007(01)
- [25] 张京祥, 吴缚龙. 从行政兼并到区域管治——长江三角洲的实证与思考[J]. 城市规划, 2004(05)
- [26] 王玉峰. 县改市辖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探究[J]. 决策, 2008(09)
- [27] 唐宁. 对市及市辖区体制关系的若干思考[J]. 领导科学, 2004(02)
- [28] 郭晓伟. 撤县改区后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凸现及其解决途径[J]. 农村经济, 2003(04)
- [29] 高志敏, 崔铭香.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教育培训考略——以上海“撤县改区”城区为例[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9(05)
- [30] 戴均良, 等. 特大城市郊区改区改市的利弊分析比较——对上海市区具体体制的调查研究[J]. 中国民政, 2000(09)
- [31] 周振鹤. 市管县与县改市应该慎行[J]. 探索与争鸣, 1996(02)
- [32] 王超敏, 司晓悦. 我国的行政区划体制改革——对现行“市管县”、“整县改市(区)”的思考[J]. 甘肃农业, 2006(06)
- [33] 张义文, 张素娟, 赵英良. 对城市化“整县改市”模式的思考[J]. 地理学与国土研究, 1999, 15(01)
- [34] 姚长俊. 断了县改市的路, 好![J]. 城乡建设, 2000(06)
- [35] 戴均良. 县改市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较好模式[J]. 领导决策信息, 2003(47)
- [36] 刘君德, 贺曲夫, 胡德. 论“强县扩权”与政区体制改革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06)
- [37] 刘君德. 县下辖市: 尝试一种新的政区制度[J]. 决策, 2005(05)
- [38] 贺曲夫, 刘焱, 孙继英. 我国县下辖市的可行性探讨[J]. 热带地理, 2010(02)

- [39] 贺曲夫. 县域多中心格局与县辖市体制创新研究——以江苏省吴江市为例[J]. 经济师, 2007(04)
- [40] 顾朝林, 浦善新. 论县下设市及其模式[J]. 城市规划学刊, 2008(01)
- [41] 顾朝林. 论中国建制镇发展、地域差异及空间演化——兼与“中国反城市化论”者商榷[J]. 地理科学, 1995(03)
- [42] 林拓, 水内俊雄. 现代城市更新与社会空间变迁[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43] 申立. 基于 GIS 的上海里弄信息管理[J]. 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05)
- [44] 林拓, 张修桂. 高新园区与乡镇经济联动发展的体制创新[J]. 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04)
- [45] 蔡伟丽, 申立. 新区实践与城市发展理念新动向[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8(06)
- [46] 王富喜, 林炳耀. 发展中心镇: 新世纪我国农村城镇化的现实选择[J]. 山东社会科学, 2005(09)
- [47] 赵勇高, 文杰, 等. 河北省中心镇选择与评价[J]. 经济地理, 2006(03)
- [48] 杨建国. 嘉兴中心镇建设区域布局问题研究[J]. 特区经济, 2010(07)
- [49] 袁中金, 刘君德, 侯爱敏. 中国中心镇镇区人口规模研究[J]. 城市规划, 2004(06)
- [50] 李阿琳, 何仲禹. 城镇化过程中社会型中心镇的集约用地研究[J]. 小城镇建设, 2009(09)
- [51] 陈俊峰. 近年来我国中心镇研究述评[J]. 城市问题, 2010(08)
- [52] 李仁彬. 以区域中心镇为重点着力推进我市城乡一体化[J]. 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 2004(05)
- [53] 蒋青. 成都市优先发展重点镇的财政支持政策分析[J]. 成都发展改革研究, 2009(06)
- [54] 李加林, 许继琴, 叶持跃. 宁波市域城镇体系中重点镇发展的若干问题研究[J]. 人文地理, 2002(03)
- [55] 李加林, 许继琴, 叶持跃. 重点镇建设指标体系研究——以宁波市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1(01)
- [56] 朱雯, 秦华, 张澜. 村镇绿地分类初探[J]. 四川农业大学学报, 2009(01)
- [57] 张开琳. 大城市郊区新市镇建设与管理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 [58] 田先钰, 覃睿. 新都市主义与新市镇建设理论: 理论演进及其基本涵义[J]. 天津科技, 2007(01)
- [59] 王蕾, 袁中金. 新加坡新市镇规划设计的探究与启示[J]. 现代城市研究, 2009(02)
- [60] 邓永成. 香港天水围新市镇社会问题的历史地理观[J]. 中国名城, 2009(07)
- [61] 娄清芳. 新市镇: 特征、经验与前景问题[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 [62] 郑溢元. 市辖区政府职能问题分析[D]. 广州: 暨南大学, 2006
- [63] 韩丽萍. 滨州市辖区全民健身健身现状与对策研究[D].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03
- [64] 罗文彬. 市辖区政府残疾人公共服务职能研究[D]. 广州: 暨南大学, 2008
- [65] 常珊珊, 杨国锋, 梁晓露. 浅析市辖区职工平均工资对中国工业布局的影响[J]. 企业导报, 2009(08)
- [66] 鱼文萍. 县域金融机构支持“三农”发展的存在问题及解决路径——对渭南市辖区 10 县(市)金融支持“三农”情况的调查[J]. 西部金融, 2008(11)
- [67] 洪振华. 市辖区行政管理体制的问题及对策[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8(08)
- [68] 赵慧峰. 县制的历史沿革与社会功能[J]. 中国行政管理, 2004(10)
- [69] 谭黎明. 春秋时期楚国的县制[J].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5(02)
- [70] 贺曲夫. 我国县辖政区的发展与改革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 [71] 戴均良. 适应我国现代化进程要求推进行政区划改革[J]. 红旗文稿, 2004(04)
- [72] 闫恩虎. 中国县制改革的思考[J]. 嘉应学院学报, 2009(02)
- [73] 刘君德. 理性认识和推进“强县扩权”[J]. 安徽决策咨询, 2004(07)
- [74] 陈翻. “市管县”与“省管县”利弊比较分析[J]. 现代商贸工业, 2009(14)
- [75] 孙学玉, 伍开昌. 当代中国行政结构扁平化的战略构想——以市管县体制为例[J]. 中国行政管理, 2004(03)
- [76] 浦善新. 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城市行政体制改革探讨[J]. 济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0(04)
- [77] 王玉琢. 省管县改革的若干思考[J]. 经济研究导刊, 2010(03)
- [78] 吴兵. 我国省管县体制改革动因研究[J]. 法制与社会: 旬刊, 2010(05)
- [79] 袁建军, 金太军. “省管县”体制改革研究——以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为研究视角[J]. 政治学研究, 2010(05)
- [80] 吴帅. “省管县”改革的维度与进度: 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0(06)
- [81] 吴红梅. 县政改革的职能定位与权力配置——省管县的视角[J]. 成都行政学院学报, 2010(01)
- [82] 寇明风, 王晓哲. 省直管县改革的三维视角: 历史经验、西方模式与实践问题[J]. 地方财政研究, 2010(03)
- [83] 黄玉姣. 关于推行“省管县”体制改革的探析[J]. 改革与开放, 2010(12)
- [84] 吴金群. 统筹城乡发展中的省管县体制改革[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0(05)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Urban District and County System in China

JIAO Miao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Ocean and Urban Science Institute,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 district and county system have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academic concern. Current relevant research has substantial results, mainly including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of urban district and county, system conversions, systemic reform and other aspects. This paper briefly reviewed scholars' research results in recent years in China, with a view to provide inspiration for future deepening study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urban district and county;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system conversions; systemic reform